

试析渤海遗址出土的釉陶和瓷器

彭善国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长春, 130012)

提要: 渤海遗址出土的釉陶器数量远多于瓷器, 其中釉陶建筑构件为渤海自产, 俑和容器可能来自中原地区。渤海釉陶生产与高句丽无继承关系, 但可能影响了辽建国初期的釉陶制作。至于渤海贡唐紫瓷盆的文献记载, 目前尚无考古资料的支持。

关键词: 渤海; 釉陶; 唐朝; 《杜阳杂编》

中图分类号: K871.7 **文献标识码:** A

一

渤海(公元698—926年)遗址出土的釉陶和瓷器,一方面体现着渤海的制陶手工业,另一方面也牵涉到渤海与中原唐王朝的关系,因此,自20世纪30年代渤海考古的工作开展以来,渤海的陶瓷遗存就引起中外研究者的关注。俄罗斯(前苏联)学者盖尔曼的研究集中于俄罗斯滨海边疆区渤海遗址出土的釉陶和瓷器^[1]。日本学者龟井明德的研究主要依靠1933—1934年东亚考古学会、1964年中朝联合考古队发掘渤海上京发掘所获釉陶器及三陵4号墓、和龙北大墓地出土的三彩器,同时也关注到了俄罗斯滨海边疆区渤海遗址出土的釉陶^[2]。中国学者李红军分析了上京城址及北大墓地的材料,认为渤海城址、墓葬出土的三彩器是唐代中原产品^[3]。后来冯浩璋又对渤海釉陶进行了专题论述^[4]。他所依靠的资料与龟井明德相同,也主要是上京龙泉府、三陵4号墓、北大墓地等遗址出土品。

本文拟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最近发表的资料,探讨渤海遗址出土釉陶及瓷器的编年,分析其与唐代中原陶瓷的关系,考察其与高句丽釉陶及契丹早期陶瓷生产的关系。不当之处,尚祈指正。

二

为便于讨论,现将渤海遗址中釉陶、瓷器的发现情况简述如下。

1. 1934—1935年日本人发掘上京龙泉府的宫城、禁苑,出土了一些釉陶建筑构件及日用器^[5]。1964年的发掘在上京宫城西区的所谓“堆房”(釉陶盘5、盆1、双耳罐1、三足器1、器盖5、壶及砚台残片、瓦当3、青瓷碗片1、白瓷碗片1)、皇城东区官署(釉陶残片28,可辨器形者有盆、罐、器盖、砚台)、东半城1号佛寺(绿釉筒瓦24、鸱尾1、兽头13、黑釉瓷罐1、白瓷碗残片2)、城北9号佛寺(绿釉筒瓦数量不详、鸱尾2、兽头8)、西半城第一列第二坊的围墙(白瓷碗1)等处都发现了釉陶或瓷器,全部所获釉陶残片在1500片以上,绝大多数出在“堆房”。瓷器共出土10件^[6]。1999年上京宫城第二宫殿出土有白胎绿釉鸱尾、绿釉柱础覆盆、筒瓦、白胎三彩兽头及殿阶螭首^[7]。2000年发掘上京宫城第三宫殿,在殿阶基附近出土有红胎绿釉筒瓦、红胎绿釉柱础覆盆、白胎三彩殿阶螭首、白胎三彩鸱尾等^[8]。2000—2001年发掘上京宫城第四宫殿,在其南侧出土三彩兽头等遗物^[9]。

2. 宁安三陵4号墓1996年发现并清理,墓葬情况尚未见详细报道,出土有三彩薰炉^[10]。

3. 吉林延边和龙北大墓地88HBM7。为近长方形封土石室墓,长2.75、宽0.9—1.2米,是该次清理的11座墓中规模最大的1座。出土三彩长颈壶、三彩折腹绞胎碗各1件^[11]。此

外，和龙北大墓地 1973 年发掘的 M28 还出土了 1 件双系红胎褐釉陶罐。M28 为长方形封土石室墓，南部有墓门。该墓在此次发掘的 54 座墓中规模中等偏下^[12]。

4. 和龙龙头山墓群石国 1 号墓 1985 年由延边州博物馆进行了清理。1998 年的再次清理在墓内发现了三彩陶俑、绞胎釉陶枕等遗物^[13]。

5. 吉林汪清红云遗址是由长方形土石结构的台基和四周分布的础石组成的建筑址，从建筑的结构及出土的佛像残件、铁风铃等遗物推断是一处寺庙址。出土白胎三彩壶、白胎三彩兽形残件（简报称器耳，但更似鍍或薰炉的器足）各 1 件^[14]。

6. 珲春密江东六洞（东云洞）二号遗址 1988 年发掘，清理出一处平面呈长方形的地面式房址，出土遗物中有施以黄釉或绿釉的建筑构件，但形制不详，推测是鸱尾或兽头一类的残件^[15]。

7. 和龙西古城 2001 年度发掘出土的建筑构件中，有釉陶的鸱尾、兽头、柱础覆盆、檐头筒瓦、筒瓦等^[16]。

8. 位于宁安渤海镇上官村哈达渡口遗址采集到模印缠枝花纹的绿釉方砖、莲花瓦当及外绿釉内黄釉的釉陶残片等遗物^[17]。

9. 1966—1967 年发掘的海林山嘴子渤海墓地据报道也出土过绿釉陶器，但材料至今未发表，具体情况不清^[18]。

10. 1996 年发掘的海林二道河子镇细鳞河遗址为一处渤海时期村落，清理出长方形半地穴房址 7 座、灰坑 40 多个、水井 1 处。出土 1 件三彩器残片，器形不辨，同时出土的还有“开元通宝”^[19]。

此外，在珲春八连城城址^[20]、珲春三家子乡新生寺庙址^[21]等地也均出土过绿釉瓦。

俄罗斯滨海地区渤海遗址出土的釉陶和瓷器数量不多，残片约 100 件。主要出土地为克拉斯基诺城址、马利亚诺夫斯克城址、尼古拉耶夫斯克 2 号城址、新戈尔杰耶夫卡城址及村落址、杏山寺庙址等。釉陶中有单色绿釉，也有三彩，器形可辨者有盒、盒盖（？）、三足鍍、敛口罐等；瓷器主要为白瓷、青瓷，器形仅见碗、盘。

朝鲜东海岸咸镜南道北青郡的青海土城（或称北青土城），朝鲜学者一般认为是渤海的南京南海府府治所在，据报道出土很多碗、盘、钵等瓷器。咸镜北道金策市城上里土城出土镶嵌菊花纹的青瓷碗。在咸镜南道琴湖地区梧梅里庙谷、咸镜北道明川郡开心寺、渔郎郡会文里“二十四块石”遗址、咸镜南道坪里墓群、梧梅里墓群、咸镜北道土垣里墓群、锦城里墓群、弓心墓群等都有瓷器出土的报道。在梧梅里还发现了被认为是渤海时期的瓷窑址，产品有素面青瓷和镶嵌青瓷^[22]。由于未见到实物，各种报道的材料又失之简略，目前我们无法确定这些遗址中出土瓷器的每个单位的确切年代及瓷器的性质，但根据高丽青瓷已有的编年成果，朝鲜半岛开始烧造青瓷的年代不早在 10 世纪后期^[23]，黄海南道峰泉郡凹山里窑址中发现的高丽“淳化三年”（公元 992 年）铭瓷器即其显例^[24]，而镶嵌青瓷的年代更是不早于 12 世纪。朝鲜东海岸发现的所谓渤海瓷窑址及城址墓葬出土的瓷器抑或是高丽时期的遗存？

综合以上叙述，可以将渤海遗址出土的釉陶和瓷器的大致情况总结如下。

1. 釉陶器的出土数量远多于瓷器，釉陶器中以黄釉或绿釉建筑构件为主，日用容器不多，且多为三彩，三彩俑更少见；

2. 虽然釉陶和瓷器多出土于都城，但在红云、东六洞、细鳞河等遗址，俄罗斯滨海地

区的中小城址及寺庙，北大 M28、M7 等中小墓葬也有出土，前引冯浩璋关于渤海釉陶三彩的使用仅限于王室及高级贵族的认识还是有偏差的。

三

由于资料的不足，目前对渤海遗址出土的釉陶器进行编年的时机尚不成熟，只能结合渤海考古的分期成果，就个别材料作初步推测。

龙头山石国 I 号墓出土的三彩女俑的形制、装束，与西安西郊鲜于庭海墓^[25]（723 年）、西安西郊中堡村^[26]等地唐墓出土的三彩女俑很相近，只是俑的表情不如唐俑生动，三彩色调不如唐俑艳丽。两例唐俑的时代在 8 世纪中叶前后。与和龙北大墓地 88HBM7 出土的三彩折腹绞胎碗形制相同的釉陶和瓷器在中原很多纪年唐墓都有发现，如西安王家坟第 90 号唐墓^[27]（褐釉绞胎）、永泰公主墓等^[28]（706 年，三彩）。类似的绿釉碗，亦见于河南巩义市黄冶窑址^[29]，其流行的时代集中在 8 世纪中叶前后。按《新唐书》地理志载，显州为天宝（742-756 年）中渤海王所都。学术界目前倾向认为渤海显州、中京同治，故址为今和龙西古城^[30]。石国、北大墓地均在西古城附近，墓中出土三彩的时代与渤海以中京为都的时代大致吻合，应该不是偶然的。由此似可推断渤海遗址中釉陶的出现约在 8 世纪中叶前后，相当于盛唐时期。

唐玄宗天宝末年，渤海文王将都城由中京迁到上京，自此直到渤海灭亡，除贞元中短暂东南迁都东京龙原府外，上京一直是渤海王都所在，故址及附近墓葬、村落所出釉陶和瓷器，其时代不会早于 8 世纪 60 年代。有学者认为，上京宫城的 3、4、5 号宫殿建于渤海文王时期；1、2 号宫殿建于大彝震时期^[31]，但目前尚无法据此详细划分五座宫殿出土釉陶建筑构件的早晚关系。至于上京及附近出土的其他釉陶和瓷器，也无法进一步分期。

四

由于目前仅发现烧造素陶建筑构件及陶器的渤海窑址^[32]，故渤海遗址出土的单色釉陶及三彩的来源，一直为研究者所关注和讨论。釉陶建筑构件在渤海都城中大量出土、类型多样，不可能都由河南、陕西的窑场输入，由此可以肯定渤海具备釉陶生产的工艺能力。对建筑构件之外的其它釉陶的来源，则存在不同的看法。前引李红军的论文认为，渤海城址、墓葬出土的三彩器是唐代中原产品。《六顶山与渤海镇》报告认为上京 1964 年出土的日用釉陶器可分为两类：一类胎白细纯，釉色鲜艳，为中原产品；另一类胎质粗且含砂，釉色暗黄，可能是本地烧造。山崎一雄曾分析了解放前日本人挖掘东京城所获的绿釉板瓦及三上次男采集的三彩碗片^[33]，前者 Fe_2O_3 的含量为 1.66%，与巩义市黄冶出土唐三彩含量相当；后者 Fe_2O_3 含量为 2.55%，明显高于中原唐三彩。由于分析的标本有限，恐怕还需要更多的测试数据来判定渤海遗址出土的日用釉陶哪些是渤海自产，哪些可能来自中原。

从釉陶器物的形制分析，前述石国墓出土的女立俑、绞胎枕，北大 88M7 出土的绞胎折腹碗，克拉斯基诺城址出土的鼓腹带足鍍均是中原釉陶中常见的典型器，在渤海的陶器中尚未见到相同的器形；上京出土的釉陶鼎、卷唇盘、带横耳的大盆，北大 88M7 及红云遗址出土的壶在中原釉陶中极罕见，相反却是渤海陶器中的常见器形。后一类器物似可判定为渤海窑场的产品，前一类即使解释为对中原同类器物的模仿，其惟妙惟肖也暗含着中原釉陶已经输入到渤海境内了。

渤海遗址出土的瓷器，如果放到 8—10 世纪初东亚陶瓷的贸易的大背景下，就会发现其数量与类型既不如统一新罗^[34]，更不如日本^[35]。渤海与唐之往来，主要通过朝贡道和营州道，后者在安史之乱后阻塞，故渤海名马、熟铜惟赖始于山东半岛登州的朝贡道达于唐。唐文宗开成四年（839 年）八月，曾有渤海之交关船泊于文登县青山浦^[36]。但也应当指出，

从登州海行至鸭绿江口，自此舟行百余里，再乘小船行三十里，方得渤海之境。转运之周折可见一斑。此外登州在唐代也不是像扬州、明州那样的瓷器出口港，山东半岛迄今甚至没有发现唐墓^[37]。渤海遗址中罕见瓷器，尤其罕见南方越窑、长沙窑产品，或与此情势有关。

五

清人朱琰曾以渤海本粟末靺鞨附高（句）丽者，而简单地比附渤海烧瓷当即高（句）丽法也^[38]。朝鲜学者认为渤海三彩陶器的基础为高句丽釉陶^[39]。日本学者三上次男也有类似的想法^[40]。这些认识显然夸大了高句丽釉陶技术的影响力，与目前的考古发现不符。

近年来对高句丽釉陶及出土瓷器的研究表明，高句丽遗址中不见釉陶建筑构件^[41]；集中出土于吉林集安、辽宁桓仁的高句丽釉陶器主要是壶、灶、盆、钵、耳杯等，其组合和器物形制与渤海遗址出土的釉陶器有很大不同^[42]；高句丽釉陶主要出土在4世纪中叶到5世纪末的墓葬中^[43]，与渤海釉陶器的流行时段有近3个世纪的缺环。集安国内城^[44]、禹山M3319^[45]等出土的瓷器均来自浙江一带瓷窑，时代为东晋。高句丽虽然具备釉陶生产的能力，但不具备烧造瓷器的工艺技术^[46]。依此4点，可以说渤海的釉陶生产、渤海遗址出土的瓷器均与高句丽没有什么继承关系。

六

公元926年，契丹灭亡渤海，在其故地建东丹国，建元甘露。典型的辽代早期陶器，在上京龙泉府寝殿遗址^[47]、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克拉斯基诺城址内水井^[48]等遗址均有发现。目前的材料还无法说清这些陶器是舶来品还是本地烧造。但珲春八连城遗址出土的刻写“维次甘露元（年）”的瓦件则应是明确的东丹国遗物^[49]。渤海灭亡后，多数遗民被迫西迁移到辽的腹地，见于史载者例不胜举，其中或有一些制陶工匠。内蒙古林西县小城子乡西樱桃沟辽代城址出土的莲花纹瓦当^[50]，与渤海上京等地出土者如出一手。而此城正是辽太祖迁渤海民所建之饶州。阿鲁科尔沁旗罕苏木苏木朝克图东山耶律羽之墓（942年葬）的主室全以绿釉琉璃砖营建^[51]，气势恢宏；主室地面也全铺以绿釉方砖，从发表的1件方砖来看，其细部装饰与唐长安太液池^[52]等地出土的方砖判然有别，而与渤海城址出土的方砖（如宫城内4号宫殿所出者）更为接近；且耶律羽之本人正是东丹国左相^[53]，是辽东渤海遗民的实际统治者。这些发现提示我们，辽代早期的陶器及釉陶生产中，存在若干与渤海遗民有关的文化因素的影响。但是这些影响显然无法与五代初期冀、晋北部窑场对辽代陶瓷工艺的影响比肩，因为后者无论是在窑工北迁所带来的陶瓷技术层面的传播上，还是在产品北播所形成的对辽代社会生活的改变上，都显然较前者突出^[54]。

曾有学者认为辽三彩是仿造唐代和渤海三彩发展起来的^[55]。但从目前的材料来看，似乎还不宜下这样的结论。辽三彩是在辽代后期才兴起的品种，见于纪年辽墓中最早的材料为内蒙古宁城县萧闳墓^[56]（1071年），此时距渤海灭亡已近一个半世纪，很难想象三彩工艺能跨越如此之大的时间缺环而得以传承。此外，辽三彩的主要器形为花式长盘、方盘、砚台、笔洗等，与渤海三彩的器形亦无相同之处。

七

研究渤海历史、唐代历史的学者，经常援引《杜阳杂编》中渤海向唐进贡“紫瓷盆”的记载，说明渤海国瓷器生产工艺之水平^[57]。该书云：“武宗皇帝会昌元年，夫余国贡火玉三斗及松风石。……又，渤海贡马脑櫃、紫瓷盆。……紫瓷盆量容半斛，内外通莹，其色纯紫，厚可寸余。举之则若鸿毛。上嘉其光洁，遂处于仙台秘府，以和药饵。后王才人掷玉环，误缺其半菽，上犹叹息久之。传于濮州刺史杨坦。^[58]”按苏鹞《杜阳杂编》编序，是书于乾符

三年（876年）秋八月编次，所记之事“自代宗广德元年癸卯，讫懿宗咸通癸巳，合一百一十载。”《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小说家类三》评价此书：“其中述奇技宝物，类涉不经，大抵祖述王嘉之拾遗、郭子横之洞冥，虽必举所闻之人以实之，殆亦俗语之为丹青也。所称某物为某年某国所贡者……唐书外国传皆无此名，诸帝本纪亦无其事。即如夫余国，久并于渤海大氏，而云武宗会昌元年夫余来贡；罽宾地接葱岭，汉书唐书均有明文，而云在西海，尤舛迕之显然者矣。”四库馆臣关于《杜阳杂编》所记宝物的这些议论显然得到了后来国外汉学家的认同。E. H. Schafer（谢弗）就曾指出“如果我们将唐代的可靠文献中的朝贡记录加以考查的话，就会发现在这些文献中并没有记载《杜阳杂编》中描述的任何一种贡物，甚至连那些‘现实中存在的国家’的贡物也不见于正史记载。……苏鹗本人的作用仅仅是用一些诡怪灵异、赏心悦目的物品填充了这个没落时代在实际进口物品方面的空白。……这些记载只能用作怀古感今的好素材，而不能作为经济学家研究工作的依据。^[59]”渤海贡唐的方物，其名类可知者按照《册府元龟》的记载，主要有鹰、各种鱼类、动物皮张、织物等，也有金银佛像、玛瑙杯等。但“内外通莹”而又“举之若鸿毛”的紫瓷器，即使是唐代名窑也不见得能烧出，在出土及传世唐代瓷器中亦从未见到，以前述渤海的陶瓷工艺水平更是难以企及。还是把它理解为《杜阳杂编》中一同记载的“常燃鼎”、“变昼草”、“灵光豆”一类灵异物品的传奇为好。

参考文献

- [1] 盖尔曼著：《渤海的釉陶和瓷器》，原载《苏联远东中世纪考古与历史资料》，133—141页，符拉迪沃斯托克，1990年。宋玉彬译文见《东北亚考古资料译文集》渤海专号，《北方文物》杂志社，1998年。《盖尔曼：《俄罗斯滨海地区中世纪的釉陶和瓷器》，符拉迪沃斯托克，1999年。沙弗库诺夫等著：《渤海国及其俄罗斯远东部落》，科学出版社，1994年，莫斯科。参宋玉彬中文译本，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184—189页。
- [2] 亀井明德：《渤海三彩陶試探》，《アジア遊学》第6号，82—98页，勉誠出版，1999年，東京。李伊萍译文载杨志军主编：《东北亚考古资料译文集》第4辑，《北方文物》杂志社，2002年，223—231页。
- [3] 李红军：《渤海遗址和墓葬出土的三彩器研究》，《文物研究》第10期（中国古陶瓷研究会95年会论文集），黄山书社，1995年。
- [4] 冯浩璋：《唐代渤海国釉陶三彩器初探》，《考古》1999年第8期。
- [5] 东亚考古学会：《东京城——渤海国上京龙泉府址的发掘调查》，东方考古学丛刊第五册，1939年，东京。
- [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六顶山与渤海镇——唐代渤海国的贵族墓地与都城遗址》，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
- [7]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学系、牡丹江市文物管理站：《渤海国上京龙泉府宫城第二宫殿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0年第11期。
- [8] 黑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学系、牡丹江文物管理站：《黑龙江宁安市渤海上京龙泉府宫城第三宫殿遗址的发掘》，《考古》2003年2期。
- [9] 黑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学系、牡丹江文物管理站：《黑龙江宁安市渤海国上京龙泉府宫城第四宫殿遗址的发掘》，《考古》2005年第9期。
- [10] 黑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龙江考古五十年》，《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年。133页。薰炉照片见马自树主编：《中国边疆民族地区文物集萃》，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20页。
- [11] 延边博物馆：《吉林省和龙县北大渤海墓葬》，《文物》1994年1期。
- [12]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博物馆、和龙县文化馆：《和龙北大渤海墓葬清理简报》，《东北考古与历史》第1辑，文物出版社，1982年。
- [13] 墓葬材料尚未发表，承延边州文管会李强先生见告。笔者2003年在延边博物馆也观摩过这几件文物。其

中1件三彩女俑的材料见《文物》1999年第10期。第1页，图1。文见同期“中国文物事业五十年”展览筹展组：《“中国文物事业五十年（1949-1999）”展览巡礼》。

[14]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汪清县红云渤海建筑遗址的发掘》，《考古》1999年第6期，52-58页。

[15] 吉林省图琿铁路考古发掘队：《琿春市东六（云？）洞二号遗址发掘简报》，《北方文物》1990年第1期。

[16] 《吉林和龙西古城城址》，国家文物局主编：《2001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2年。113-117页。

[17]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宁安县镜泊湖地区文物普查》，《黑龙江文物丛刊》1983年第2期。

[18] 孙秀仁：《略论海林山嘴子渤海墓葬的形制、传统和文物特征》，《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434页。

[19]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学系：《1996年海林细鳞河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北方文物》1997年4期。

[20] 斋藤优：《半拉城及其它史迹》，半拉城址刊行会，京都，1978年。

[21] 《吉林省文物志》编委会主编：《琿春县文物志》，73页，1984年。

[22] 金宗赫：《朝鲜东海岸一带渤海遗迹研究》，（韩国）图书出版中心，2002年，汉城。该书主要章节的译文见《历史与考古信息·东北亚》2003年第1期。

[23] 郑良谟（金英美译）：《高丽青瓷》，文物出版社，2000年。

[24] 金荣措：《从冈山青瓷窑址来看我国早期陶瓷器的发展》，在日本朝鲜社会科学者协会历史部会编：《高句丽·渤海与古代日本》，雄山阁，东京，1993年。85-118页。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编：《高丽青瓷诞生——初期高丽青瓷及其展开》（日文），24-26页。财团法人大阪市美术振兴协会，2004年。

[2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唐长安城郊隋唐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59页，彩版七，图版七六-七八。

[26]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安西郊中堡村唐墓清理简报》，《考古》1960年第3期。图版柒，1。

[27]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安王家坟村第90号唐墓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9期。30页。

[28]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永泰公主墓发掘简报》，《文物》1964年第1期。23页，图32。

[29]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著：《黄冶窑考古新发现》，大象出版社，2005年。80页，图52。

[30] 参宋玉彬等：《渤海中京显德府故址——西古城城址研究简史》，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编：《边疆考古研究》第3辑，科学出版社，2004年。195页。

[31] 刘晓东、魏存成：《渤海上京城主体格局的演变——兼谈主要宫殿建筑的年代》，《北方文物》1991年第1期。

[32] 烧造素陶建筑构件及陶器的窑址，在宁安杏山（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渤海砖瓦窑址发掘报告》，《北方文物》1986年第2期。）、图们凉水新兴洞、（资料未刊，参李强、侯丽闽：《延边地区渤海遗存之我见》，新泻大学环日本海研究会：《渤海与环日本海交流》（环日本海论丛第8号），1995年9月。后载《北方文物》2003年第4期。）、俄罗斯克拉斯基诺城址（博尔金等：《克拉斯基诺城址四年“一体化”考察》，《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通讯》2001年第3期。宋玉彬译文见《东北亚历史与考古信息》2004年第1期。）、乌苏里斯克区科尔萨科夫卡村（博尔金：《渤海的陶窑——依据科尔萨科夫卡村落遗址的资料》，《远东历史与考古——祝贺沙弗库诺夫70华诞》，远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王德厚译文见《东北亚考古资料译文集》第四辑，《北方文物》杂志社，2002年。）、纳杰日金斯科耶区的阿纳尼耶夫卡城堡（霍列夫：《阿纳尼耶夫卡城堡遗址附近的陶窑》，《苏联远东中世纪时代研究的新成果》符拉迪沃斯托克，1989年。王德厚译文见《东北亚考古资料译文集》渤海专号，《北方文物》杂志社，1998年。）等地均有发现。

[33] 转引自龟井明德：《渤海三彩陶试探》，《アジア遊学》第6号，82-98页，勉誠出版，1999年，东京。李伊萍译文载杨志军主编：《东北亚考古资料译文集》第4辑，北方文物杂志社，2002年，223-231页。

[34] 三上次男：《朝鲜半岛出土中国唐朝陶瓷及其历史意义》，《朝鲜学报》第87辑。

- [35] 长谷部乐尔、今井敦编:《中国的陶瓷》第12卷《日本出土的中国陶瓷》,平凡社,1995年,东京。奈良县立橿原考古学研究所附属博物馆:《贸易陶瓷——奈良·平安的中国陶瓷》,由良大和古文化研究协会,1993年,奈良。苕岚:《7—14世纪中日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 [36] 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顾承甫等点校本,上海古籍出版社,67页。
- [37] 齐东方:《隋唐环岛文化的形成和展开——以朝阳隋唐墓研究为中心》,载王小甫主编:《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133页。
- [38] [清]朱琰:《陶说》卷五,说器中。《生活与博物丛书》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78页。
- [39]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李云铎译):《朝鲜考古学概要》,黑龙江省文物出版编辑室,1983年。263页。林浩成、金成镐著:《渤海问题学术报告会》,《历史科学》1997年第4号。李云铎译文见《历史与考古信息·东北亚》2001年第1期。
- [40] 三上次男:《渤海·辽的陶瓷》,《世界陶瓷全集·13·辽·金·元》,小学馆,1981年,东京。145页。
- [41] 魏存成:《高句丽考古》,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年。97-100页。
- [42] 1976年清理的山城下墓区365号墓出土1件长颈酱釉陶壶,与渤海釉陶壶形制相似。原认为是高句丽末期的墓葬,但现在一般认为是渤海墓葬,参董长富:《集安出土的几件渤海时期文物》,《博物馆研究》1997年1期。渤海时期,集安属桓州,近年来在国内城等地就出土了典型的渤海莲花纹瓦当,参注[44]。
- [43] 耿铁华:《高句丽釉陶器的类型与分期》,《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3期。
- [44]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集安市博物馆编著:《国内城——2002—2003年集安国内城与民主遗址试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4年。
- [45] 孙仁杰:《集安禹山M3319发掘报告》,《东北史地》2005年第6期。
- [46] 金荣措:《从円山里青瓷窑址来看我国早期陶瓷器的发展》,在日本朝鲜社会学者协会历史部会编:《高句丽·渤海与古代日本》,雄山阁,东京,1993年。85-118页。认为円山里1号窑的时代可早至高句丽,但证据不足。
- [47] 侈口篋纹罐,T117: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六顶山与渤海镇——唐代渤海国的贵族墓地与都城遗址》,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95页。图55-1,图版70-3。
- [48] 长颈壶,盖尔曼等:《克拉萨基诺城址井址发掘》,《远东历史与考古——祝贺沙弗库诺夫70华诞》,远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宋玉彬译文见《东北亚历史与考古信息》2004年第1期。博尔金:《1994—1998年对滨海地区渤海遗存的考古学考察研究成果》,《东亚的古代和中世纪史——渤海国建国130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资料,符拉迪沃斯托克,1998年。辛冰译文见《北方文物》2005年第4期。
- [49] 八连城遗址2005年发掘材料。
- [50] 冯永谦、姜念思:《辽代饶州调查记》,东北考古与历史编辑委员会:《东北考古与历史》第1辑,文物出版社,1982年。216页,图七,8-9。
- [51]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赤峰市博物馆、阿鲁科尔沁旗博物馆:《辽耶律羽之墓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第1期。盖之庸:《探寻逝去的王朝——辽耶律羽之墓》,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4年。29页。
- [5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日本独立行政法人文化财研究所奈良文化财研究所联合考古队:《西安大明宫太液池南岸遗址发现大型廊院建筑遗存》,《考古》2004年第9期。
- [53] 盖之庸编著:《内蒙古辽代石刻文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2年。2-11页。
- [54] 彭善国:《辽代陶瓷的考古学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03年。
- [55] 李逸友:《略论辽代契丹与汉人墓葬的特征与分期》,《中国考古学会第六次年会论文集》,187—196页,文物出版社,1987年。
- [56]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辽中京博物馆:《宁城县埋王沟辽代墓地发掘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魏坚主编):《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609—630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
- [57] 如张泽咸:《唐代工商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139页。
- [58] [唐]苏鹗:《杜阳杂编》卷下,《丛书集成初编》据《学津讨原》排印本,21页。
- [59] E. H. Schafer. *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kand, A Study of Tang Exotics.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 p37-39. 中译本见[美]谢弗著、吴玉贵译:《唐代的外来文明》,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年。61-66页。

On Lead-glazed Relics and Porcelain of Bohai

Peng shan-guo

(Research Center for Chinese Frontier Archaeology,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Abstract: lead-glazed relics unearthed from Bohai sites include tiles, bricks and pottery, tiles and bricks were made in the Bohai regime, pottery might come from the Tang Empire. Lead glaze craft might affect the early Liao, but have little relations with the koguryo.

Keywords: Bohai; lead-glazed relics; Tang Empire

基金项目: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青年项目

作者简介: 彭善国 (1971-), 男, 汉族,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副教授。